

# 中国北方地区出土商周铜铙研究

王 祁 岳洪彬

关键词：北方地区 商周时期 铜铙 组合 铙架

KEYWORDS: Northern Regions Shang and Zhou Periods Bronze *nao* Bell Assemblage Bronze *nao* Bell Support

**ABSTRACT:** Bronze *nao* bells during the Shang and Zhou periods can be divided into large and small examples. The latter are primarily found in northern regions and are representative instruments of the Yin culture, attracting significant scholarly attention. Small, northern *nao* bells often appear in sets of three, forming a *biannao* (set of *nao*), used in combination with other musical instruments. Various combinations of *biannao* have been observed; for example, a tomb may contain two sets of *biannao*, or combinations of *biannao* with other instruments like chime stones or drums. The more complex the *nao* bell assemblage, the higher the rank of the tomb. Assemblages of *nao* bells, chime stones, and drums are only found in large, high-ranking tombs. The position of the *biannao* within the musical ensemble is also noteworthy. Inscriptions of “left,” “middle,” and “right” are often found on handles of bronze *nao* bells, indicating their placement within the ensemble. Small, northern *nao* bell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wo types: those with and without rings, which were used in slightly different ways. *Nao* bells with rings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origins of the stem of *yong* bells during the Western Zhou period.

“铜铙”是指流行于晚商到西周中期的一种带柄合瓦形青铜击奏体鸣乐器，罗振玉依据《周官·鼓人》注“铙如铃，无舌，有秉，执而鸣之”称这类带柄合瓦形青铜乐器为“铙”<sup>[1]</sup>，学术界一般沿用这一称呼。从考古学分类而言，“铙”可分为北方小铙<sup>[2]</sup>和南方大铙，本文主要讨论北方小铙。故此，若无说明，本文所说铜铙，多指北方小铙。

“铙”未必是铜铙的古名。李纯一认为铙本以竹木为之，甲骨文中“庸”字就是铜铙的古名<sup>[3]</sup>。“庸”，又作“镛”，即《诗经·大雅·灵台》“贲鼓维镛”之“镛”，说明“庸”为铜制乐器。这种铜制“庸”具

有明显的时空特征：在时间上，从晚商时期使用到西周时期，此后基本不见；在地域上，流行于北方地区。就考古发现的商周金属乐器而言，仅铜铙符合“庸”的这一时空特征。故我们赞同李纯一的观点，认为铙就是甲骨文、金文常见之“庸”。但是，这一观点也面临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即考古材料与汉代注疏的互证问题。《灵台》郑玄笺：“贲鼓，大鼓也。镛，大钟也”。《诗经·商颂·那》：“庸鼓有鞀，万舞有奕”。毛传：“大钟曰庸”。《说文·金部》、《尔雅·释乐》皆训“镛”为“大钟”。若依这些注释，“庸”是种体形较大的乐器，绝非

作者：王祁，北京市，100012，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岳洪彬，北京市，10010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方铜铙所能比拟。所以有学者认为南方地区所出的大铙，才是甲骨文、金文及传世文献中的“庸”<sup>[4]</sup>。然则，商周大铙只见于南方地区，而没有出现于北方地区，殷人应不会在甲骨文中频繁记录这种非殷墟所有的器物。因此，汉代经学家之所以训“庸”为大钟，或是错把“镛”当作了“罍”的缘故。《尔雅·释乐》：“大钟谓之镛”。郭璞注：“《书》曰：‘笙镛以闲。’亦名‘罍’，音博”。三国时期经学家孙炎也有类似的注。“罍”就是常说的青铜“罍”。《仪礼》中的“罍”，在《释文》中写作“罍”。戴家祥很早之前就指出，在古文字中，“镛”、“罍”及相关的异体字字形接近，传世典籍中“镛”、“罍（罍）”不互见，认为典籍中的“镛”就是“罍”之误变<sup>[5]</sup>。戴说“镛”、“罍”及相关异体字因字形接近，而存在误释的可能性，应该是正确的，否则郭璞也不会认为“镛”就是“罍”。不过，戴说又把典籍中的“镛”都视为“罍”之误变，则明显与甲骨文、金文中早已存在的乐器“庸”不符。因此汉代经学家们可能因“镛”、“罍”字形的接近，且典籍中二者不共出，才把二者混为同一种乐器。若此，就能解释经学家何以用大钟训“庸”，因为在汉代经学家的著作中，“罍”、“罍”都可训为“大钟”<sup>[6]</sup>。可见，汉代经学家训“庸”为大钟，不足为据。“庸”确应指北方地区出土的青铜小铙。

虽然铜铙的古名为“庸”，但由于学术界已习惯称其为“铙”，称“庸”反而会引起定名上的混乱。故本文依旧沿用“铜铙”的名称。铜铙是年代最早的青铜钟类乐器，对商周礼乐文明有着重要影响，因而是学术界重点关注的对象。除了定名，学术界对铜铙的研究还涉及到铜铙的起源、组合、音律，及其与甬钟的源流关系等方面<sup>[7]</sup>。但由于铜铙形制单一，铭文简单，学术界对铜铙的组合、使用方式等问题，尚有研究不足的地方。对此有必要立足于铜铙的组合，对相关

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

据统计，北方商周时期遗址至少已出土80件铜铙，主要分布于河南、山东、山西三省，陕西宝鸡地区也出土1件。这些铜铙的基本形制相似，可据柄部（或称“甬部”）特征分为无环铙、有环铙两型，其中对有环铙的论证，有助于明晰铜铙与西周铜甬钟的关联。

## 一、铙与磬、鼓的组合方式

商周青铜器往往有两个层面的组合：其一是同形、同铭组合，其二是不同形、不同铭组合。以铜铙为例，前者指同形、同铭铜铙组合成编列，类似于周代的编钟；后者指同形、同铭铜铙与其他铜铙、其他类型乐器的组合，类似于周代不同型式编钟组合，或编钟与其他乐器组合。对于同形、同铭铜铙的组合，学术界已有较好的研究。如针对殷墟妇好墓出土的5件铜铙，朱凤瀚早已提出分为两组编铙的可能性<sup>[8]</sup>。王秀萍从铭文、大小、锈蚀程度等方面将它们分为两组，并认为商代编铙的基本组合规律为3件一组<sup>[9]</sup>。常怀颖同样认为晚商编列小铙以3枚为列组基数<sup>[10]</sup>。这些观点基本可信，商周墓葬中铜铙多以3件成组，即是明证。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商周铜铙的组合，要以墓葬中的铙数为准，有多少件铜铙，就使用什么样的组合<sup>[11]</sup>。这实际上是另一个层面的组合模式，即不同编列铜铙的组合使用。

除了3件一组的编铙，及编铙与编铙的组合，还有编铙与其他乐器的组合模式，此方面颇值深究。常怀颖认为殷墓中的乐器组合方式有鼓与磬，磬与埙，小铙与磬，磬、埙与小铙四种，并认为不同阶层的人群随葬不同规格的乐器，如商王与其他人的区别，可能在于磬与鼓，而不在于小铙<sup>[12]</sup>。这一观点有其合理之处，即注意到了乐器组合的等级性；但此观点忽略甲骨文等早期文献记载，因而对铜铙在乐器组合中的重要作

用认识不足。从甲骨文材料来看,铜铙在与石磬组合之外,尚可与鼓组合,如《甲骨文合集》30693“其置庸豆(鼓)”、《甲骨文合集》31017“庸豆(鼓)其罍烹豆(鼓)罍”<sup>[13]</sup>。“庸”指铜铙,“庸(铜铙)”、“鼓”连用,说明铜铙也可与鼓组合使用。前文所举《诗经》中的“賁鼓维镛”、“庸鼓有斲”等诗句,也说明“庸”与“鼓”组合使用。裘锡圭指出,甲骨文及传世文献中的“庸鼓”一词较为常见,很可能专指一种与庸配合的鼓,这证明商人经常以鼓与庸(铙)并用<sup>[14]</sup>。可见,铜铙是商王常用的乐器,并与鼓等乐器组合使用,铜铙在乐器组合中的地位也应很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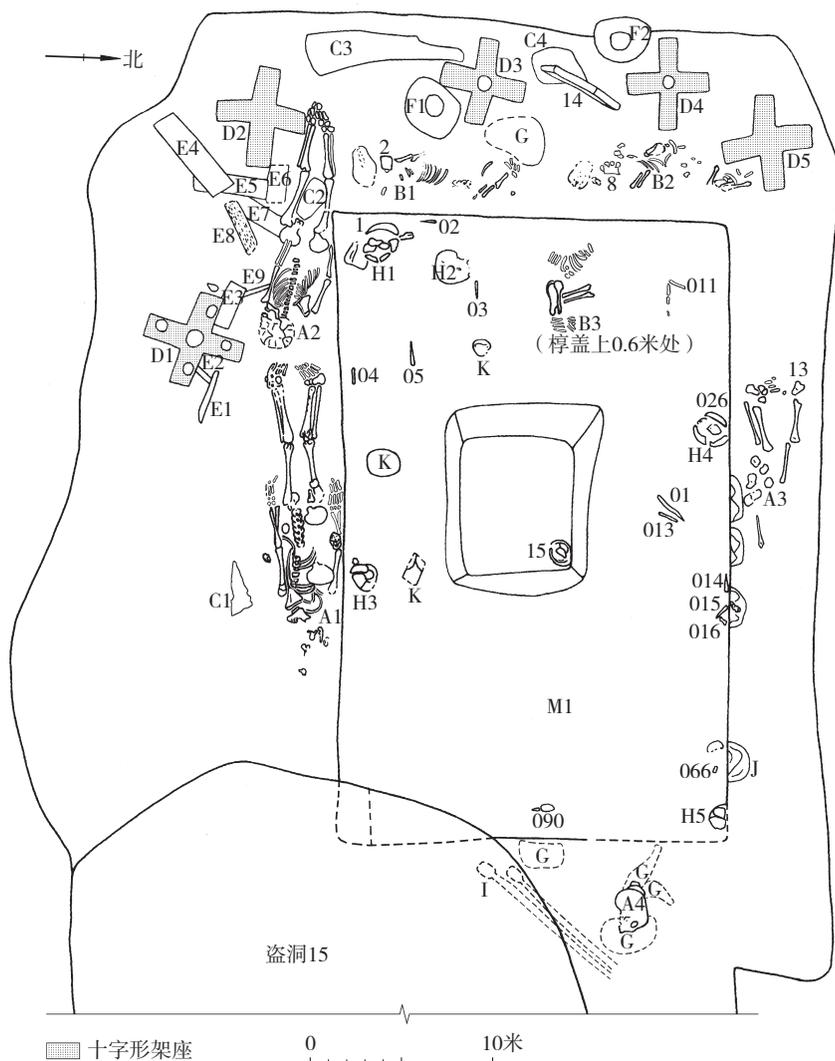
从考古材料来看,铙与磬有着较为明显的组合关系,这一点常怀颖已做了较好的梳理<sup>[15]</sup>,本文不再赘言。需要强调的是,铙还可与鼓形成组合关系。直接证据为山西闻喜酒务头M1,该墓是商末周初大型墓葬,带有墓道,出土大量青铜礼容器,其椁盖上方偏东位置放置一组铜铙,不远处就为一装饰鳄鱼骨板的鼉鼓痕迹<sup>[16]</sup>。除了酒务头M1,一些商末周初的大型墓葬中也有铙、鼓组合的痕迹。据洪石研究,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出土的“嵌蚌漆牌饰”很可能就是木制嵌蚌漆鼉鼓的残存部分<sup>[17]</sup>。前掌大墓地有4座大墓中随葬“嵌蚌漆牌饰”,其中2座墓葬中下压石磬,带墓道的墓葬M206随葬铜铙。考虑到前掌大M206同时还出土有鳄鱼骨板,说明此墓中确实存在鼉鼓遗存,洪说可信。不独前掌大M206同时出土铜铙和鳄鱼骨板,M213也同时出土铜铙和鳄鱼骨板,再次证明前掌大墓地存在铙、鼓的组合<sup>[18]</sup>。

铙与鼓的组合,正对应着甲骨文及传世文献中“庸”与“鼓”的固定组合,是考古材料与文字、文献材料的“二重证明”。铙既可以与磬组合,又可以与鼓组合,铙、磬、鼓三种敲击乐器是否可以组合在一起使用,殷墟遗址部分被盗大墓之中就有铜编铙与漆

木鼓、石磬组合的线索。

第一个线索来自小屯西地商代大墓M1。小屯西地大墓是殷墟文化晚期双墓道大墓,出土不少与音乐考古有关的遗迹<sup>[19]</sup>。该墓的西二层台、西南角、西北角发现5个十字形木架座(图一),其中西部2个十字形架座D3、D4中间有1件石磬(M1:14),石磬竖立嵌进二层台内,发掘者认为这件石磬为悬磬,两侧的十字形架座为悬磬磬架的底座。在北二层台东北角填土内有1件鼉鼓,应对应着北二层台西端的十字形架座D5<sup>[20]</sup>。西南角有2个十字形架座D1、D2,发掘简报认为它们也是磬架。然该墓仅发现1件石磬,不应有两副磬架。而且,该墓除了北二层台的鼉鼓,也未见其他木质乐器。故西南角的2个十字形架座,很可能就是被盗走铜铙的铙架底座,用于安置青铜乐器。若这一推测可信,则小屯西地大墓中的乐器组合应为铙、鼓、磬的组合。

第二个线索来自侯家庄HPKM1217,该墓是四条墓道的商王大墓<sup>[21]</sup>。该墓西墓道出土漆木鼓、石磬各1件,以及多组乐器架子遗存,乐器与乐器架分开放置。值得注意的是,西墓道仅有鼓、磬两种乐器,并发现4个十字形架座,却有3件横梁、6件木柱。按照1个乐器架是由2个十字形架座、2根立柱及1根横梁组成的一般规律,据横梁、木柱的数量,侯家庄HPKM1217西墓道本应存在3个乐器架,对应6个十字形架座、3根横梁、6根木柱。发掘报告认为西墓道还应该还有2个十字形架座,只是由于盗洞的破坏不复存在。3个乐器架如何与漆木鼓和石磬对应,发掘报告认为其中1个乐器架与石磬对应,2个乐器架与漆木鼓对应,漆木鼓通过绳子悬在2个乐器架的下面<sup>[22]</sup>。不过,这一推测存在逻辑问题,因为乐器架为木质,除非架子本身极其笨重,或者架子有办法固定在地上,否则漆木鼓很容易拉倒这2个乐器架。这种装鼓方式,反而不如单用1个乐器架稳固。



图一 小屯西地大墓乐器的十字形架座分布图

1.象牙觶 2、8.铜铃 13.陶爵 14.石磬 15.陶罐 01.玉饰 02~05、013~016.残骨器 026.残陶箕形器 066.骨饰 090.铜罍(或罍)柱 A1~4.殉人 B1~3.殉狗 C1~4.席纹 D1~5.“十”字形木架 E1~9.木构件 F1、F2彩绘皮革类漆器朽痕 G.彩绘 H1~5.人头 I.方首漆杖(2件) J.鼙鼓 K.残漆器(据《河南安阳市殷墟小屯西地商代大墓发掘简报》图六改绘)

而且，从商周各类乐器架的发现情况来看，也没有2个乐器架拉1件乐器的情况。故这一推测在逻辑与材料两个方面都不能成立。

侯家庄HPKM1217西墓道的3个乐器架中，应有1个对应着漆木鼓，此漆木鼓以悬鼓的形式置于鼓架之下。悬鼓的起源甚早，《诗经·周颂·有瞽》有“应田县(悬)鼓，鞀磬祝圉”的诗句，可见悬鼓在西周时

期业已存在。《殷周金文集成》6761著录1件晚商时期的铜觚<sup>[23]</sup>，觚铭为“𠄎”，其中的“𠄎”部与甲骨文中的“𠄎(鼓)”字下部完全一致，应该像木鼓悬挂于器架下。《礼记·明堂位》：“夏后氏之足鼓，殷楹鼓，周悬鼓”。强行把“楹鼓”归殷，“悬鼓”归周，则有可能是将战国时期存在的几种装鼓方式，演变为时代的差异，并非历史的真实<sup>[24]</sup>。

除了悬鼓所对应的1个鼓架外，石磬也可对应1个磬架，多余的1个乐器架则最可能对应青铜乐器。据此推测，侯家庄HPKM1217西墓道的乐器组合，也应如屯西大墓一样，3个乐器架对应3

种乐器，第三种乐器很可能是已被盗的铜编铙。

由于小屯西地大墓与侯家庄HPKM1217大墓均被盗严重，没有青铜铙出土，故铙、鼓、磬三种乐器的组合方式仅为推测。但这一推测是有依据的，除了上述墓葬中乐器的遗迹现象，还有两方面的依据。第一，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言，墓室开口面积在十多平

方以上的高等级商系墓葬（常有墓道，或随葬较多青铜礼容器）一般都会随葬铜铙，如鹿邑长子口墓面积约60平方米<sup>[25]</sup>、青州苏埠屯M8面积约49平方米<sup>[26]</sup>、闻喜酒务头M1面积约37平方米<sup>[27]</sup>、殷墟妇好墓面积约22平方米<sup>[28]</sup>、花园庄东地M54面积约16平方米<sup>[29]</sup>、郭家庄M160面积约13平方米<sup>[30]</sup>，这些墓葬皆随葬铜铙。这说明铜铙可能是商系高等级墓葬的“标配”。侯家庄HPKM1217为带有四条墓道的商王大墓，是所有商系墓葬中等级最高者，它也应随葬有铜铙。小屯西地M1是带有两条墓道的大墓，墓室开口面积在40平方米左右，等级也很高，铜铙也应是其必配的随葬品。第二，甲骨文中常见铙、鼓配合使用，说明铙、鼓组合至少是商王可以使用的乐器组合形式，这与侯家庄HPKM1217是商王大墓的事实相吻合。据这两方面的依据，以及小屯西地大墓、侯家庄HPKM1217的遗

迹特点，晚商时期大贵族之墓，极可能随葬有铙、鼓、磬组合的乐器。

根据以上分析，铜编铙的组合形式较为多样，除了与磬组合，还可与鼓甚至同时与磬、鼓组合。为了更好说明铜铙组合与墓葬等级之间的关系，笔者统计了部分殷墟遗址出土铜铙墓（表一）。

据表一可知，殷墟出土铜铙墓往往有一定等级，且出土铜铙的组合与墓葬等级有一定的对应关系。首先，殷墟墓葬随葬铜铙就是等级的象征，葬铙墓一般要随葬2套铜觚、爵，目前尚不见1套铜觚、爵墓随葬铜铙的情况。其次，铙、磬组合等级更高。殷墟遗址中随葬铜铙与石磬组合的墓葬，往往是随葬9套铜觚、爵以上的高等级贵族墓葬，墓主人往往是大族族长，地位很高。再次，铙、磬、鼓组合等级最高。在殷墟遗址，铙、磬、鼓组合仅见于商王大墓与双墓道大墓。

表一 殷墟出土铜铙墓及其等级表

编号	单位	等级	组合	资料来源
1	侯家庄HPKM1217	商王大墓	石磬、木鼓及可能存在的铜铙	《侯家庄第六本·1217号大墓》第25页
2	小屯西地M1	双墓道大墓	石磬、木鼓及可能存在的铜铙	《河南安阳市殷墟小屯西地商代大墓发掘简报》
3	妇好墓	王后墓	铜编铙（两套铙）、石磬	《殷墟妇好墓》第100、198、199页
4	花园庄东地M54	9套铜觚、爵	铜编铙、石磬	《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第133、212页
5	郭家庄M160	铜觚10、角10	铜编铙、石磬	《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04、120页
6	大司空M303	铜觚6、爵10	铜编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第425、429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7	戚家庄M269	铜觚3、爵2	铜编铙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戚家庄东商代墓地发掘报告》第222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
8	郭家庄东南M26	2套铜觚、爵	铜编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郭家庄东南26号墓》，《考古》1998年第10期
9	1958大司空村M51	2套铜觚、爵	铜编铙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1958年春河南安阳市大司空村殷代墓葬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10期
10	1983大司空M663	2套铜觚、爵	铜编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3年安阳大司空村东南的一座殷墓》，《考古》1988年第10期
11	高楼庄M8	铜觚2、爵1	铜编铙	周到、刘东亚：《1957年秋安阳高楼庄殷代遗址发掘》，《考古》1963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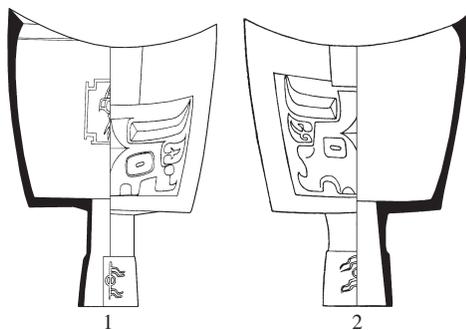
至于铙、鼓组合的等级，由于材料不多，本文暂不讨论。总之，就目前的材料来看，殷墟的敲击乐器组合大体存在的等级层次从高至低为编铙、磬、鼓组合，编铙、磬组合与编铙组合。

## 二、编铙在组合中的位置

编铙既可与编铙组合，也可与鼓、磬等乐器组合，且编铙在组合时很可能有一定的位次规律。编铙位次规律，可由编铙所具有的方位铭文证明。

在有铭铜铙中，有一些“中”字铭铙，如安阳郭家庄M160<sup>[31]</sup>、殷墟西区M699<sup>[32]</sup>各有3件柄部铭“中”字铜铙（图二，1、2），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上海博物馆也各藏有1件柄部铭“中”字铜铙（《集成》370、371）。对于这些“中”字铭，学术界多认为是族徽铭文<sup>[33]</sup>。与“中”字铭类似，部分传世铜铙还有“左”、“右”铭，如吉林大学收藏1件亚卣铜铙，腔内有“亚卣”铭，柄部有“左”铭（《集成》403）。《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也著录1件亚卣铜铙<sup>[34]</sup>，腔内有“亚卣□辛”四字，柄部有“又（右）”字（《铭图》15913）。这2件铜铙中的“左”、“右”铭文也皆在铙的柄部，不在铙的内壁。

铜铙有铭，且以族徽铭文为主，族徽



图二 殷墟出土“中”字铭铜铙

1.郭家庄M160：41 2.西区M699：4（1引自《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04页图80-1，2引自《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图七一-3）

铭文多位于铙身，常见于腔内，铙柄虽也可铸族徽铭文，但并非普遍现象。如在殷墟墓葬所出铜铙中，除了上举两组“中”字铭铜铙外，还有7组20件有铭铜铙，其铭文基本都是确凿的族徽铭文，其中6组17件铭文皆铸在腔内，另外1组铭文铸在壁外“台面”上，不见铸在柄部<sup>[35]</sup>。《铭图》一书著录74件晚商和西周时期有铭铜铙（《铭图》15851~15924），除10件待讨论的“左”、“中”和“右”铭铜铙，其余64件铜铙中，族徽铭文在铙柄的仅9件，占比为14%；族徽铭文在铙身的有55件，占比为86%。这两组数据足证铙柄铸族徽铭文的现象并非主流。但是，铜铙的“左”、“中”和“右”铭文皆位于柄部，凡6组10件，这就与铜铙族徽铭文多位于铙内壁的规律相违背。如果铜铙的“左”、“中”和“右”铭文不表示位置，而是族徽，何以所有与方位有关的族徽铭文都会被铸造在柄部，而没有一例被铸在铙身，这明显与铜铙族徽铭文多铸在铙身的现象不符。

而且，殷墟西区M699所出铜铙、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上海博物馆藏铜铙都仅有“中”字铭，没有其他铭文，若“中”是族徽铭文，最应被铸在鼓内壁，而不是柄部。郭家庄M160铜铙除了柄部“中”字外，其鼓内壁有“亚夷止”铭文，与M160其他铜器上的“亚夷止”族徽铭文一致，若将“中”也视为族徽铭文，则与墓中铭文无法对应。这再次证明铜铙柄部的“左”、“中”和“右”铭文很难被视为族徽铭文。

这些“左”、“中”和“右”铭铜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传出安阳武官村西北冈1001号大墓的左、中、右盃（《集成》9315、9316、9317），研究者认为墓葬中出现的这类“左”、“中”、“右”铜器与器物摆放位置有关<sup>[36]</sup>。实际上，不独左、中、右铜盃上的铭文与方位有关，甲骨文中也存在大量表示方位的“左”、“中”、“右”<sup>[37]</sup>。

乙未卜，□贞：立事于南，右从

我，中从𦉳，左从曾。《合集》5504  
(《合集》5512同文)[宾出]

辛酉卜：又(侑)汙，弜𦉳在右立(位)。

《合集》27884[历无]

壬辰卜：子𦉳宜，右、左惠𦉳用，  
中惠𦉳用。

壬辰卜：子亦𦉳宜，惠𦉳，于左、  
右用。《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198<sup>[38]</sup>

前一条卜辞中的“左”、“中”和“右”  
代表着位于此三个方向的军队，后两条卜辞  
中的“左”、“中”和“右”是祭品摆放的  
位置。这样看来，铜铙铭文“左”、“中”  
和“右”可能也反映了编铙所处的位置。

《合集》31017：“庸壹(鼓)其罍烹  
壹(鼓)𦉳。弜𦉳”。这里的“𦉳”，与上举  
《花东》198“𦉳宜”之“𦉳”同义，都表  
示置放、陈设之义，陈设的方法是要看什么  
方位合适。“庸”既然需要陈设，自然就要  
涉及到左、中、右的方位，就如同《花东》  
198中“𦉳宜”一样。

由于部分铜铙本身就铭有方位，对于这  
些铜铙而言，《合集》31017中的“𦉳庸”  
极有可能是按此方位来摆设编铙的位置。

不过，编铙存在多种形式的组合，既有  
编铙之间的组合，也有与非铙乐器的组合。  
对于编铙与编铙的组合，如妇好墓、长子口  
大墓所出的2组编铙在组合使用时，很可能  
要分出左、右。上举2件亚卣铜铙，皆为“亚  
卣”族所有，它们形制相同，极有可能时代  
相近，暗示“亚卣”族在一定时间内同时使  
用过左、右两套编铙。当“亚卣”族使用  
左、右两套编铙一起演奏时，“左”铭的那  
一组编铙就应放在左边使用，“右”铭的那  
一组编铙放在右边使用。

如果“中”铭铜铙也表示其在几组编  
铙组合时的位置，就意味着商周时期尚有三  
组编铙组合使用的方式。这固然存在着可  
能性，但目前商周墓葬中不见三组铜铙共  
出。对此，需要注意的是，商代“左”、

“中”和“右”的位置关系，并不限定于  
同类或同形事物，不同的事物依旧可构成  
“左”、“中”和“右”的位置关系，如上举  
《花东》198所载𦉳、𦉳就不相同。《合集》  
1064“……伐不三人，以中宜宰”，辞虽残，  
但人性之外，中间奉之宰牲的意思极为明  
确，这是人性与宰牲组成位置关系。铜铙既  
然可与其他类型乐器组合使用，那么铜铙柄  
部的“左”、“中”和“右”字铭文，未尝不  
是表示其与其他类型乐器组合使用时的位  
置关系。这其中，“中”字铭铜铙意味着此  
组编铙位于乐器组合的中间位置。

总之，铜铙柄部的“左”、“中”和  
“右”铭文表示的应是方位，非族徽铭文，  
“左”、“中”和“右”方位符合铜铙的多  
层次组合关系。因而，编铙在组合中的位  
次，就是本文在讨论编铙组合时必须涉及  
的内容。

### 三、铜无环铙装架方式

所谓“无环铙”，是指柄部没有半圆形  
环的一类铜铙，共出土70多件，是铜铙的  
主流形态。学术界所讨论的北方地区铜铙，  
多指无环铙。

学术界以往认为铜铙主要是手持乐器，  
如罗振玉认为铙柄中空便于续木执持<sup>[39]</sup>，  
陈梦家称其为“执钟”<sup>[40]</sup>，这确实适合柄  
部较细的铜铙。如鹿邑长子口大墓出土1  
组铜铙(M1:149、152、153)柄部较细，  
发掘报告认为无法装木柄，只能手持<sup>[41]</sup>。  
这种细柄铜铙可被称为“执钟”。

对于绝大多数无环铙而言，手持并非  
主流的使用方式。从考古发现看，不少无  
环铙的柄部都残存朽木痕迹，这说明多数  
铜铙是插入木柄使用的。有学者认为插木  
的原因是便于手持，但手持铜铙，铜铙  
容易晃动，敲击时很容易音色不准，故  
此，铜铙的主流使用方式应非手持。

关于铜铙的使用方法，甲骨文、金文有

“置庸”一词。

……其置用（庸）于丁…… 《合集》1989[宾出]

□□[卜]，出贞：其置新用（庸）。九月。 《合集》25901[出一]

其置庸壶，于既卯。 《合集》30693[无名组]

己酉，戌铃尊宜于召，置庸，觥九律，觥赏贝十朋。万剌方彝（《集成》9894）

与“置庸”类似，甲骨文还有“置鞞”（《合集》22543）、“置壺（鼓）”（《合集》32419、34478）等辞，皆是建置乐器的意思。“置”字，甲骨文中一般写作“𠄎”、“𠄎”形，可隶定为“𠄎”，裘锡圭认为此字象征以两手置物于器架，其中“𠄎”旁就是器架之形<sup>[42]</sup>。

“置庸”，就是将铜铙安置于铙架上的意。鹿邑长子口大墓东椁室主要放置的是乐器、兵器，椁室中部有一处南北向的灰痕，外涂朱砂，长约1.5、宽0.06米，6件铜铙散乱分布在灰痕附近，发掘报告认为此处灰痕当为铙架木痕<sup>[43]</sup>。这是铜铙置架的考古学证据。但铜铙如何装置于铙架上，尚需从多个角度进行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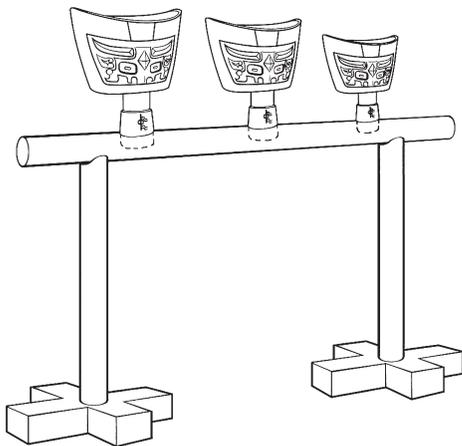
首先，商周铜铙多是按照3件一组的编铙使用，3件铜铙的形制相似，大小递减，铜铙的摆放位置，很可能依据其体形为依据。长子口大墓出土的一组编铙（M1:152、153、149），按大、中、小体形一字南北向排开，正与铙架的灰痕方向一致，说明铜铙安置于铙架时，确实是按体形编列的。这与两周时期编钟、编磬的编列方式一致，当无可疑。其次，岳洪彬指出，殷墟青铜器纹饰是有方向性的，遗迹内青铜器的摆放方式要符合其方向性，而铜铙上纹饰的方向决定了铙柄向下、铙口向上的摆放方式<sup>[44]</sup>。再次，《诗经·大雅·灵台》有“虞业维枏，贲鼓维镛”，毛传曰：“植者曰虞，横者曰枏。

业，大版也。枏，崇牙也”。说的就是铙架，可见“虞业维枏”是鼓和铙的架子形状，其形状主要有立柱“虞”、横梁“枏”（《释名》谓“箕”）、横梁上的装饰之物“业”与“枏”等。

据上述三方面内容，对铙架及编铙装于架进行了复原（图三）。铙架的底座参考了小屯西地大墓与侯家庄HPKM1217中的十字形架座。

图三所示铜铙安置方式，还参考了古文字材料。上文所引“置庸”的古文字材料中，万剌方彝中的“置”字写作“𠄎”，与一般的“置”字略有差异，其特点是器架之上有分叉的“V”形，正与铙架之上的三铙对应，暗示“𠄎”形的“置”字有可能是置放铜铙的专用字形。《合集》25371有辞：“来早王其𠄎丁，汎，𠄎（置）新……”。“𠄎”也是类似于“𠄎”的字形。参考《合集》1989“其置用（庸）于丁……”、《合集》25901“其置新用（庸）”等，可推测《合集》25371后面所残的辞很可能就是“用（庸）”。若此，则“𠄎”可以进一步说明，甲骨文中部分“置庸”之“置”字，是仿铙的安置方式造字形的。

除了甲骨文、金文中“置”字的字形，金文族徽也能提供一些线索。上举《集成》6761“𠄎”铭铜觚，“𠄎”字之上的



图三 铜铙安置方式复原示意图

表二 三座大墓中乐器架的尺寸数据

墓葬	架梁长度	立柱间距	立柱高度	其他
鹿邑长子口大墓	1.5米 (铙架)			
小屯西地大墓		1.2~1.3米(推测为铙架)		磬架立柱高度在1米以上,立柱间距约为1米
侯家庄HPKM1217	第一组2.26米,第二组2.25米	第一组1.2~1.3米,第二组约1.3米	第一组1.3米,第二组1.3米	

说明:由于侯家庄HPKM1217发掘报告认为西墓道仅有木鼓、石磬两种乐器,故仅有鼓架、磬架的尺寸数据,第一组为发掘报告中的鼓架尺寸,第二组为磬架尺寸。

“𠄎𠄎”部固然可能是单纯的装饰物品,但也可能是安置于鼓架之上的乐器。类似材料还有《集成》1137著录的1件鼎铭,写作“𠄎”,器架上的3件器物应当与“𠄎”字中“𠄎𠄎”形所表示的器物相同。这类器物可与鼓连用,且3件一组,应该就是编铙。

可见,无论是考古材料,还是从甲骨文、金文及族徽铭文材料,都足以支持图三的铜铙装置方式。

关于铙架尺寸,目前能说明尺寸的数据主要有三组(表二)。据表二,可推知铙架梁(即文献中的“簨”)长度为1.5~2.2米,此长度要略长于两立柱(即文献中的“虞”)间的距离,这是因为架梁两端一般都要超出立柱一定距离。立柱的高度代表了铙架的高度,从表二来看,铙架的高度约为1.3米,这与小屯西地大墓磬架高度一致。当铜铙装于铙架之上时,还需加上铜铙本身的高度。铜铙的高度一般不会超过0.25米,装架后铙与架的通高当在1.6米左右。这正是一个人站立时敲击铜铙的高度。据此,表二中的铙架尺寸,应能够代表商周时期铙架的大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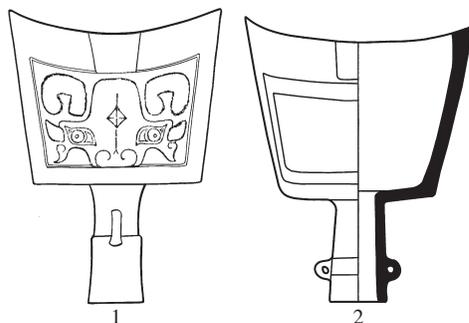
#### 四、略论铜有环铙

铜有环铙,是指铙柄装饰一个或两个半圆形铜环,环直接装饰在铙柄或铙柄的凸棱上。如陕西宝鸡竹园沟M13出土1件铜铙(M13:9),钲面饰云角兽面纹,口内凹成弧形,平顶,柄部中空与顶相连,柄中部

有一半圆形环<sup>[45]</sup>(图四,1)。这件铜铙,学术界对其命名并无争议。此铙的年代不会晚于西周早期,半圆形环直接装饰在柄上。上海博物馆藏1件亚夷铜铙(《铭图》15891),钲面饰云角兽面纹,口内凹成弧形,口沿内部有“亚夷”铭文,

柄部有一周凸棱,凸棱两侧饰一对半圆形铜环。亚夷铙非出土遗物,其纹饰及铭文都具有殷墟文化时期特征,是典型的殷墟文化时期铜铙,这一点也较少有争议。从竹园沟M13所出铜铙和亚夷铜铙来看,铜铙有环,并非不可思议之事。

亚夷铜铙并非年代最早的有环铙。吉林大学藏亚夷铜铙(《铭图》15887),扁筒形器身,钲面饰回字形弦纹,正鼓部有台面,柄部两侧有一对半环形钮(图四,2)。如果不考虑柄部的环,亚夷铜铙整体形制与殷墟遗址发现的殷墟文化第二期回字纹铜铙如妇好墓M5:839/1<sup>[46]</sup>、郭家庄M26:36<sup>[47]</sup>及高楼庄M8所出铙<sup>[48]</sup>形制相似,铜铙基本呈瘦长体、回字纹特征(图五,1、2)。西周时期虽偶见回字纹铜铙,但铙体较粗胖,柄部较短<sup>[49]</sup>(图五,3),与殷代铜铙差异明显。因而,亚夷铜铙的年代,可能要早到殷墟文化



图四 商周时期铜有环铙

1.宝鸡竹园沟M13:9 2.吉林大学藏亚夷铙(1引自《宝鸡虢国墓地》第49页图三五-2,2引自《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第110页图六五-2)

第二期，为年代最早的铜有环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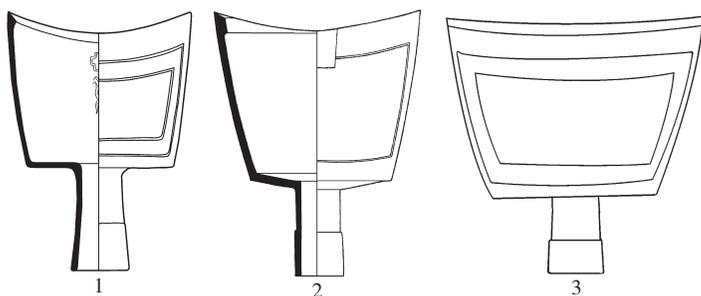
上述3件铜有环铙的命名，学术界争议不大，争议较大之处在于山西翼城大河口M1所出的一组铜铙。山西翼城大河口M1出土两组铜铙，除了一组无环铙，还有3件一组饰口字形凸弦纹的有环铙，鼓部较窄，无台面，柄部粗短，中部有凸棱，凸棱上有半圆形环<sup>[50]</sup>（图六）。关于这组铜铙的定名，有必要详细讨论。

发掘简报与研究者的多将大河口M1所出铜有环铙命名为“甬钟”，故这组编铙被称为“编钟”<sup>[51]</sup>。之所以称为“甬钟”，大约是因为此套铜编铙的柄部有凸棱、环，凸棱、环很容易与甬钟的旋、干对应起来。而且，此套乐器正鼓面的“台”已消失，与铜铙形制不同。关于柄部的凸棱与环，从上文所举的亚疑有环铙和亚夷有环铙来看，除非认为这2件铜有环铙应被定名为甬钟，否则就可知道棱与环，也即旋与干，并非甬钟独有的特征。正鼓部“台面”的消失，应是西周时期回字纹铜铙的特征。如洛阳林校车马坑、山东威海环翠所出铜铙，正鼓部也都无“台面”<sup>[52]</sup>（见图五，3）。可见，无敲击的“台面”，并不是判定是否为铜铙的决定性因素。

大河口M1出土铜有环铙之所以不能被称为“甬钟”，还因其形制和组合与甬钟差异较大。首先，从形制上看，大河口M1出土铜有环铙的主体部分，更接近铙，而非甬钟，不具备甬钟所具有的钟枚特征，柄部也较一般的甬钟甬部更短。其次，从尺寸上看，大河口M1所出3件铜有环铙，最大1件通高18.1厘米，最小1件通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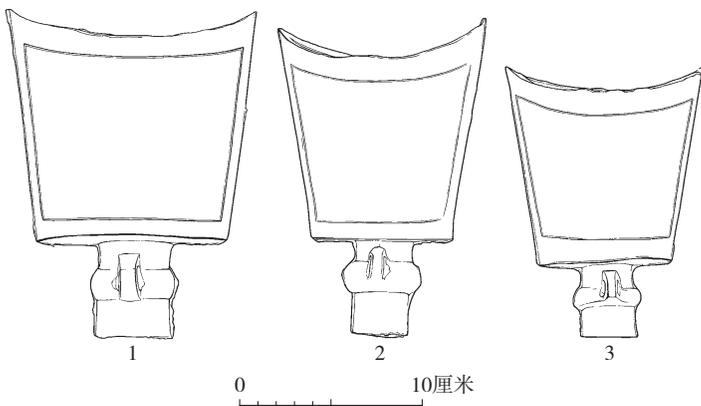
14.8厘米，与其他典型铜铙的尺寸一致，而与体形硕大的编钟尺寸完全不同。再次，从组合看，西周早中期的编钟虽然也常见3件一组，但基本都是拼凑出来的<sup>[53]</sup>，这与大河口M1所出3件一组的铜有环铙不同。

据此，大河口M1的3件铜有环铙，应归为铙类，而不是“甬钟”。也因此可知商周有环铙虽非铜铙的主流形式，但此类器物自殷墟文化第二期便已存在，并延续使用至西周早期晚段。有环铙并非是受西周时期铜甬钟影响才出现的新器形，更非铜铙向铜甬钟转变过程中的中间产物。至于有环铙的使用方式，由于环的存在，有环铙不适合手持。有环铙柄部的半圆环干可接绳索，以悬挂于器架。不过，这些有环铙也可能非悬挂使用，而是如无环铙一般置架使用。铙被长时



图五 商周时期回字纹铜铙

1.小屯M5：839/1 2.郭家庄东南M26：36 3.洛阳林校C3M230：6（引自《殷墟妇好墓》第101页图63，2引自《河南安阳市郭家庄东南26号墓》图一七-1，3引自《洛阳林校西周车马坑》图一三）



图六 翼城大河口M1出土铜有环铙

1~3.M1：19、23、20（引自《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一号墓发掘》图八五）

间击打，柄部会松动，置环穿绳可起加固的作用。

有环铙对认识西周甬钟的起源颇有帮助。关于甬钟起源，有一颇有影响力的观点，即认为甬钟是由南方大铙演变而来，此说俗称甬钟起源的“南来说”<sup>[54]</sup>。这一观点有其合理的地方。甬钟与南方大铙的关系，主要在于南方大铙发展到西周早期时，已出现有枚、有篆带的形式，在形制上体现了明显的过渡性。但甬钟的甬部都有旋和干，南方大铙的甬部虽然有旋，却尚未发现干。因此，“南来说”至少无法解释“干”的来源。相对的，也有学者指出，甬钟的干可能来源于铜铙的环<sup>[55]</sup>。这一观点符合目前的考古发现。铜有环铙出现于殷墟文化第二期，最初半圆形环较小，但之后半圆形环逐渐变大、变粗，到西周时期已发展出显著“干”的特征。这样一个从“环”到“干”的演变序列，已较为明显。因此，甬钟的干部确实最可能来源于铜有环铙的环部。

## 五、结 语

商周文明是一种礼乐文明，因而礼器和乐器一直都是学术界研究的重心。铜铙作为晚商时期重要乐器，自然也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北方地区的青铜小铙起源于殷墟文化早期，延续至西周中期，不仅是殷文化的重要乐器，还对周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铜铙可分为无环铙和有环铙两类，前者是主流型式，后者较为少见，但对西周时期铜甬钟起源有一定的作用。从使用方法看，无环铙固然可以手持，但更普遍的是置架使用，3件一组，以编铙的形式插在铙架之上。编铙还是标识墓葬等级的乐器，随着编铙与其他乐器形成越来越复杂的组合关系，墓葬的等级会越来越高，目前可知，商王大墓或王室贵族大墓可使用铙、磬、鼓组合。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编铙柄部有“左”、“中”和“右”铭文，这些铭文不是族徽铭文，而是方位

词，指示编铙在各类组合中的位置。编铙及其组合能够与墓主人的级别建立起对应关系，意味着商代的乐器制度已较为成熟，乐器不仅仅是演奏音乐的工具，还是明贵贱、别等级的标识物。

### 注 释

- [1] 罗振玉：《古器物识小录》，见《雪堂类稿·甲·笔记汇刊》，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
- [2] 小铙主要出土于北方地区。北方地区之外，仅见2002年安徽寿县苍陵城遗址出土1件（陆勤毅等：《安徽江淮地区商周青铜器》第14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在形制上与晚商时期常见的兽面纹铜铙相同。该铜铙为南方地区孤例，出土背景不明，共存器物较少，暂不用讨论。
- [3] 李纯一：《试释用、庸、甬并试论钟名之演变》，《考古》1964年第6期；《庸名探讨》，《音乐研究》1988年第1期。
- [4] 裘锡圭：《甲骨文中的几种乐器名称》，见《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 [5] 戴家祥：《释甬》，见《戴家祥学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 [6] 《尔雅·释乐》注中，李巡、孙炎等人都训“庸（镛）”为大，然典籍中的“庸”字本无此训，有此训的是“甬”（罇读甬声）字。这也可以视为汉代经学家混训二字的证据。
- [7] 关于北方地区所出铜铙的专题研究，除李纯一的研究成果外，较重要的成果如下。
  - a. 方建军：《河南出土殷商编铙初论》，《中国音乐学》1990年第3期。
  - b. 张伟：《殷墟出土编铙研究的若干浅见》，《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 c. 王秀萍：《殷墟妇好墓铜铙组合方式新探》，《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2年第3期。
  - d. 常怀颖：《论商周之际铙钟随葬》，《江汉考古》2014年第1期。
  - e. 闫浩：《商代编铙与先秦礼乐的肇始》，《中原文物》2016年第5期。
  - f. 任晓琳：《北方地区出土先秦铜铙初探》，见《海岱考古》第十三辑，科学出版社，2020年。

- g.陈南南、王子初：《殷商编铙的类型学与双音性能研究》，《中国音乐》2022年第3期。
- [8] 朱凤瀚：《中国古代青铜器》第234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
- [9] 同[7]c。
- [10] 同[7]d。
- [11] a.王子初：《残钟录》第306页，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  
b.李纯一：《先秦音乐史》第55页，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  
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300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
- [12] 常怀颖：《殷墟随葬乐器补议》，《音乐研究》2018年第5期；《考古学视野中的古代中国乐制和乐礼起源》，见《礼观乐史——人文视野下的中华礼乐文明》，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年。
- [13] 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第10册第3746、3782页，中华书局，1981年。以下简称为《合集》。
- [14] 同[4]。
- [15] 同[12]。
- [16]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山西省闻喜县酒务头商代墓葬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2年第10期。
- [17] 洪石：《鼙鼓逢逢：滕州前掌大墓地出土“嵌蚌漆牌饰”辨析》，《考古》2014年第10期。
-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第545~547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
-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小屯西地商代大墓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9期。
- [20] 关于此鼙鼓与北二层台西端的十字形木架座的对应关系，或为一对一的关系，即1根立柱立于座架之上，鼙鼓贯于立柱之上，形成与东周时期建鼓相似的装鼓方式。《礼记·明堂位》曰：“夏后氏之足鼓，殷楹鼓，周悬鼓”。郑玄注：“楹，谓之柱，贯中上出也”。郑玄所注的“楹鼓”就是这样的装鼓方式。不过，由于小屯西地M1被盗较为严重，也不排除北二层台上本还有另一个十字形木架座，只是被破坏掉了。若是如此，则存在一鼙鼓对应2个十字形木架座的对应关系，鼙鼓就要以悬鼓的方式存在。
- [21]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六本·1217号大墓》第25页，历史语言研究所，1968年。
- [22] 除了发掘者，学术界也多如此认为，参见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第4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方建军：《侯家庄——1217号大墓的磬和鼓》，《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
-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第五册第3932页，中华书局，2007年。以下简称为《集成》。
- [24] “楹鼓”就是建鼓，东周时期仍较常见，非商代所独有。《明堂位》认为“悬鼓”是周代独有的装鼓方式，但《淮南子·泛论训》有“禹之时，以五音听治，悬钟鼓磬铎”的传说，说明也有传世文献认为“悬鼓”并非仅属于周人的文化传统。故此，《明堂位》之分，未必可信。
- [2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第9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 [26]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州市博物馆：《青州市苏埠屯商代墓发掘报告》，见《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
- [27] 同[16]。
-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第7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 [2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第71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 [3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第7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 [31] 《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04页。
- [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 [33] a.《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25页。  
b.谢明文：《商代金文研究》第53页，中西书局，2022年。
- [34]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29卷第47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以下简

称为《铭图》。

- [35] 这些墓葬包括妇好墓、花园庄东地M54、53大司空M312、58大司空村M51、83大司空M663、04大司空M303、戚家庄M269。参见如下文献。
- a.《殷墟妇好墓》第100页。
- b.《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33页。
- c.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9册，1955年。
- d.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1958年春河南安阳市大司空村殷代墓葬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10期。
- e.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3年安阳大司空村东南的一座殷墓》，《考古》1988年第10期。
- f.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第425、429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 g.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戚家庄东商代墓地发掘报告》第222、225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
- [36] 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第27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 [37] 赵鹏：《谈谈殷墟甲骨文中的“左”、“中”、“右”》，见《甲骨文与殷商史》（新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 [3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第163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以下简称《花东》。
- [39] 同[1]。
- [40] 陈梦家：《中国铜器综述》第157页，中华书局，2019年。
- [41] 《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第126页。
- [42] 同[4]。
- [43] 《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第20页。
- [44] 岳洪彬：《殷墟青铜器纹饰的方向性研究》，《考古》2002年第4期。
- [45]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獬国墓地》第49、50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 [46] 《殷墟妇好墓》第100、101页。
- [4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郭家庄东南26号墓》，《考古》1998年第10期。
- [48] 赵霞光：《安阳市西郊的殷代文化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2期。
- [49]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林校西周车马坑》，《文物》1999年第3期。
- [50]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一号墓发掘》，《考古学报》2020年第2期。
- [51] a.毛悦、谢尧亭：《钟钲相鸣：大河口西周墓地M1青铜乐器及其意义》，《大众考古》2018年第1期。
- b.方建军：《音乐考古学研究》第74页，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9年。
- c.同[50]。
- [52] 郑同修、隋裕仁：《山东威海市发现周代墓葬》，《考古》1995年第1期。
- [53] 王友华：《西周甬钟编列的“拼合现象”——兼析甬钟的来源》，《中国音乐》2015年第1期。
- [54] a.高至喜：《中国南方出土商周铜铙概论》，见《湖南考古辑刊》第2辑，岳麓书社，1984年。
- b.殷玮璋、曹淑琴：《长江流域早期甬钟的形态学分析》，见《文物与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 c.高西省：《西周早期甬钟比较研究》，《文博》1995年第1期。
- d.彭适凡：《赣江流域出土商周铜铙和甬钟概述》，《南方文物》1998年第1期。
- e.王子初：《中国音乐考古学》第145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
- [55] 陈荃有：《悬钟的发生及双音钟的厘定》，《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责任编辑 李学来）